

党领导运城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

我的运城·红色记忆

运城古称河东，位于山西省西南部，西与陕西、南与河南隔黄河相望，东倚太行山与山西晋城相连，北接吕梁山与山西临汾接壤，是扼守中原大地与山西、西南腹地的天然屏障；城内中条山横贯东西，绵延160多公里，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中条山北面的盐湖，有4000多年开采历史，是中国历朝历代的财富宝库，运城之名也由盐运贸易而来。

运城是一个具有“上百万年文明起源，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地方。这里发现了4500万年前印证人类最早起源的世纪猿化石，勘探到180万年前人类最早用火痕迹的西侯渡遗址；有女娲补天、黄帝战蚩尤、舜耕历山、禹凿龙门等人类远古传说；农耕文明的起源螺祖蚕、后稷教民稼穡在运城都得到了考古验证；尧都蒲坂（后迁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及夏朝都城，都在运城境内。运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过傅说、猗顿、关羽、裴秀、裴度、王勃、薛仁贵、柳宗元、司马光、关汉卿等一大批灿若星河、光耀中华、彪炳千秋的文武俊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的清王朝腐败无能，任列强肆意欺凌，在这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奋起抗争，经过八十多年的上下求索，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东方古国近代以来国运转折的开端。从此，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开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拨迷雾、驱阴霾，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真正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推翻旧世界、创建新中国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伟大而壮丽的新征程。

1926年春，中共运城支部诞生，运城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至1927年7月，运城共建立了13个中共支部和1个中共县委。1928年6月，中共河东特委成立。这是运城第一个全区的党组织，即运城市（地）委的前身。土地革命战争的10年，运城党组织多次被破坏，先后经历了河东特委、河东特委支部、河东中心县委、再到河东特委、河东中心县委等时期，虽然经历腥风血雨，但党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1934年初到1937年，运城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一直在康康杰等同志的领导下独立开展革命活动，成立了绛县红军游击队和晋南红军游击队，组织了平陆夺枪、稷山山暴动、中条山暴动等斗争，这些斗争在山西革命史上影响深远。

全面抗战爆发后，阎子祥同志受组织委派，回到运城组建了河东工委（后改为河东特委），随后整顿恢复重建了运城各地党组织。运城沦陷后，河东特委所属蒲韩铁路以西以北各县划归中共吉特委，铁路以东以南各县划归中共豫特委。1939年10月，为应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党在中条山地区成立中条地委，晋豫特委所属运城各县归中条地委领导。

中条山战役后，党重新开辟中条山抗日根据地，中条地委一分为二，建立条西地委（后改为太岳五地委）和条东地委（后并入太岳四地委）。新乡吉特委所属汾南各县归太岳五地委（汾北的新绛、稷山、河津仍属新乡吉特委领导）。这一时期，虽然党的组织机构变换频繁，但运城人民的抗日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从支援八路军东渡黄河北上，到建立八路军兵站确保后方交通安全，再到开辟中条山抗日根据地，运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2月，太岳五地委改为太岳三地委。太岳三地委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军区部队先后发动了闻夏战役、晋南反攻和运城攻坚战，在有力策应和支援陕北战场的同时，也使运城在1947年12月28日获得了解放。解放后的运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进行土地改革，医治战争创伤，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医疗、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一方面发扬中国人民伟大的团结奋斗精神，不以自我安乐为满足，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组织干部西进南下，为全国解放和新解放区的建设作出了无私奉献。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运城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回望历史，是为了坚定初心，走向更加光辉的未来。

回顾总结党领导运城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就是为了更加坚定运城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的步伐。

运城党组织建立后，运城地区的共产党人就担负起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面对社会主义建设重任，运城地区的共产党人毫无畏惧，勇往直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运城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山西革命活动的重要区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运城党组织坚持斗争，领导了多起工农学生运动，其中盐池工人罢工、大益成纱厂工人罢工、安邑驱逐贪官县长郑裕孚和蒋氏“八一农暴”等，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当时，山西省委屡遭破坏，全省党的革命活动南移，运城成为这一时期全省革命活动的重要区域。全省先后在中条山召开了四次有影响的会议，推动了运城乃至全省的革命斗争。这四次分别是：1927年秋，山西临时省委代书记王鸿钧在夏县下留村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把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会后山西尤其是运城党组织有了一定的恢复发展；1928年6月，山西临时省委在夏县堆云洞召开的运城党组织会议，加强党对河东暴动区工作的领导，会上成立了

中共河东特委，这是运城市（地）委的前身；1929年6月，中共顺直省委特派员汪铭在夏县堆云洞召开的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指示精神的会议，纠正了大革命失败后，山西党组织在工作中存在的急躁冒进情绪，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1930年春，中共太原临时市委书记冯彦俊主持召开的夏县裴介会议，研究全省武装斗争的开展，安排部署太原和河东暴动。这四次会议及其斗争成果在山西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运城党组织积极探索开展武装斗争，这是当时山西乃至北方各省少有的。运城共产党人在发展组织、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和放松领导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先后领导和组织了多次武装斗争，其中在山西乃至北方影响深远的武装斗争有两次。一是1934年4月，在绛县小华庙成立了运城地区第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绛县红军游击队。游击队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等斗争，坚持斗争达7个多月。二是1936年农历三月，为响应和配合红军东征，嘉康杰组织成立了一支50多人的晋南红军游击队，并进行武装暴动，在中条山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分粮食、烧契约”的打土豪斗争。红军回师陕北后，这支革命武装被血腥镇压，游击队队员和革命群众80余人被杀害。

——运城党组织充分动员群众，使运城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前后方战略通道发挥了重要作用。运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八路军挺进华北抗日的主要战略通道。1937年8月至10月，八路军三大主力先后在荣河县（今属万荣县）庙前东渡黄河，途经运城的万荣、河津、稷山、新绛等县北上抗日。运城党组织动员300余名船工，历时两个多月接送3万余人渡河。沿途各县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大力支持，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奔赴抗日前线。同时，运城人民为保障八路军兵站的运转作出了巨大贡献。1938年7月，八路军在黄河北岸的垣曲县关家村设立了兵站，随后在垣曲县同善镇北堠村设立了分站，主要用于转运抗战物资，保障人员往来安全。全民族抗战期间，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人员多次途经兵站，运城党组织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保障工作。

——运城党组织坚持中条山游击战，开辟的中条山根据地是晋冀鲁豫根据地和太岳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运城境内横贯东西的中条山和流经数县的黄河构成了保卫延安的坚固屏障。抗战期间，运城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在中条山筑起了一道抗战的不倒“长城”。1941年5月，党抓住时机开辟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在西北地区建立了稷麓、新绛、闻喜、稷山、安邑、垣南、万泉、平陆等抗日县政府和太岳五专署，在条东地区先后建立了绛县、垣曲等7个抗日县政府，配合八路军南进支队开辟了南北长100余里、东西宽300余里，拥有20余万人口的根据地，并与大岳区连成一片。

——在运城打响的晋南反攻战和运城攻坚战，是解放战争中我军战略大反攻的最早战役之一，有力地支援了陕北战场，为解放军学习城市攻坚战积累了经验。解放战争时期，晋南是陕北解放区的前哨。1947年3月，蒋介石

石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为了支援陕北战场，从侧翼打击、牵制胡宗南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太岳军区部队于1947年4月4日发起晋南反攻战役，至5月12日解放了晋南大部分县。5月初，陈赓所部晋冀鲁豫第四纵队第一次攻打运城。1947年10月，在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指挥下，晋冀鲁豫第八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第二次攻打运城。1947年12月17日，徐向前指挥晋冀鲁豫第八纵队、王震所部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与太岳军区部队第三次攻打运城。经过12天的激战，至12月28日，运城宣告解放。晋南反攻战役和运城攻坚战，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在陕北作战，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贡献；二是人民解放军从中学会了城市攻坚战；三是有效配合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敌后；四是解放大西北和进军大西南打开了通道。

——运城解放后，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百姓，无私奉献、舍身为国，大力支援全国解放。一是组织大批干部“西进南下”接管新区。从1948年初开始，运城抽调干部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接管福建、四川、甘肃等新解放区，为新生政权的建立作出了应有贡献。二是大批运城儿女踊跃参军支前。翻身解放后，获得了土地的运城人民，并没有满足于小我的富足，而是义无反顾地以各种方式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斗中。从1947年到1949年，先后有万余名青年在家乡解放后加入解放军奔赴解放战争最前线；有五千多名民工，组成有近千副担架的远征队，随军前往大西北支前，转战陕、甘、宁、青等省，行程6000多公里胜利完成支前任务。三是为解放战争无私捐献了大量的粮食等物资。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期间，运城各县支前的小麦有2254万斤、花料114万斤、人力车4.17万辆。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正确总结和客观对待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一个执政党成熟的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政党，始终十分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作为河东儿女，让我们铭记党领导运城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这一段光辉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再接再厉，砥砺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

由运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研究室）提供

文化视线

寒假期间，4名中央民族大学的大一学生踏上探寻运城古城遗迹的人文旅程。他们从2月8日至12日，花费5天时间，走访了在2021年10月暴雨中受损的部分运城古城。

“探迹·寻记”运城古城调研队于去年11月正式成立，小队队长刘政良在学校老乡群里发出邀请，安之尧、高子彦、王祎琳立即响应，这4名来自不同学院的大一新生在线上第一次聚在一起。“微信群聊组建好后，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古城之旅的行程。”来自新闻传播学院的大一新生高子彦对记者说，“4名山西人中有3个运城人，我们第一选择就是运城古城。大家查阅资料后，行程具体到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帝家庙，盐池禁墙东禁门，安邑太平兴国寺塔，临晋县衙，万荣飞云楼、后土祠，芮城城隍庙、永乐宫9处历史遗存，并正式向学校递交申请报备计划。”

古城之旅启程

2月8日，调研小队在盐湖景区集合。这也是他们4人在线下第一次见面。“开始大家还有些不熟悉，但后面小组分工后，每个人也都展现出了专业的一面。”队长刘政良介绍，“高子彦负责拍摄和剪辑，安之尧整理资料，王祎琳做问卷数据分析，我承担撰写最后的书面报告。”

次日，4人小队扛着摄像机，走进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帝家庙、盐池禁墙东禁门。受去年暴雨影响，解州关帝庙崇圣寺塔楼漏雨，春秋楼二楼大面积漏雨威胁到“夜读春秋”塑像；盐池禁墙东禁门塔城大面积坍塌，城台顶面严重塌陷，城墙出现多处裂缝。刘政良谈及这些损毁带给自己震撼时说：“东禁门城墙坍塌处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看到如此宏伟的城墙部分坍塌为土方，觉得特别惋惜，看到如此宏伟的城墙部分坍塌为土方，觉得特别惋惜，看到如此宏伟的城墙部分坍塌为土方，觉得特别惋惜。现在，它已经被围挡隔绝起来细心保护修复，让它不再继续坍塌破损的风险，也许这样才会让它更好地诉说历史的沧桑。”“关帝庙那边都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注意日常维护就好。但四龙壁受损较为严重，调研时正在封闭维护并不对外开放，从远处可以看到四龙壁上方已加盖防雨棚，并没有多个支撑柱以防坍塌，保护措施科学严谨。”王祎琳补充道。

“我们2月10日和11日又分别探访了临晋县衙、飞云楼、后土祠，对运城古城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更为这片土地厚重的历史和身为运城人感到自豪。”高子彦说。小队里唯一不是运城娃的安之尧来自晋城市，她直言实践期间走过的运城古城不过是零光片羽，却看到了运城对于古城保护所作出的努力。“我看到了相关部门基于文物实际情况采用旅游开发式管理、封闭管理、乔迁保护等保护措施，同时还积极推进‘社会认养’的贯彻落实，在这些举措中，可以看到相关部门对古城保护的因地制宜、传承为本、民生关怀。”她说。

2月12日，古城之旅也来到了终点站永乐宫和城隍庙。在永乐宫，4人小队见到了无极殿内的《朝元图》在时光洗刷下历久弥新，依旧闪烁着过去的荣光。安之尧感叹道：“在游览过程中，讲解人员告诉我们永乐宫的故事，让我们大为震撼。为防止水库建设造成文物淹没，永乐宫进行了长途迁徙。经过来自各地的技术人员密切商讨，最终采用人力拉锯法，将附有壁画的墙壁锯下，并将壁画进行细致剥离，经过运送、重组、描摹完成迁移。此工程困难重重，历时5年，才得以成功。”“高子彦提到，王祎琳略被曲折的道路惊惧，直至抵达，众多游人祭拜祈福的景象瞬间将她拉回千年以前，巍峨劲秀、古朴精美的秋风楼也让她不住地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高子彦提及永乐宫和芮城城隍庙的保护措施，讲明牌匾和房檐周围的金属网给自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不仅对其他古城保护是一种借鉴参考，也是创新了保护古城的方式方法。”

终点站再出发

“古城之旅的结束，不是我们小队调研的终点。”高子彦指出，他们在实地调研古城后，就联系了市文旅局，想从这里找寻到更专业、全面的古城保护资料。“市文旅局就给我们推荐了‘文物专家咨询室’，联系了很多次都是闭馆状态，其间又打了无数电话咨询开放时间，终于在重新开放第一天约好了专家会谈。”高子彦说。

3月7日早10时，高子彦代表团队在文物专家咨询室，见到了文博研究员李百勤。“李老师给我们普及了运城现今文物保护的情况，讲解了文物保护可能遭遇的困境和挑战，以及对文物创新性保护的探索尝试。”高子彦说。李百勤讲到了我市县级文物、未登记在册的文物众多，给保护工作带来许多挑战。“有很多文物在私人手里，是他们的祖宅，可他们不清楚其文物价值，很可能因为个人原因自行拆毁。还有一些是因为地处偏远山区，早就荒废没人居住或管理了，得不到有效、及时的修缮维护，加速了老建筑的损毁，等到再发现已经于事无补。”李百勤说。

咨询结束后，高子彦告诉记者：“古城保护应该是多方面努力采取综合保护措施的结果。对于古城保护不应一味从批评的方面来看，要看到现存的问题和已经做得很好的措施并且知道了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创新性保护，李老师已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们相信如果该思路可以延续下去会对低级别文物的保护起到很好的作用。”刘政良在调研报告上写下：“咨询专家后我对古城保护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认识到古城保护并不是文物部门一个单位便能做到的，它也不是离我们公众距离很远的一件事。古城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充足的资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需要提升公共意识，让古城保护走进大家心中，共同维护好这凝固的艺术。对于创新性保护，我认为在坚持‘修旧如旧’的基础上要尽可能结合现代科技（如VR、全息投影）、流行文化，让古建筑‘活’起来，吸引更多年轻受众，不仅能够做到创新性保护，也能通过引导公众深入了解古建筑背后的文化故事，起到更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其实这个调研小队还有隐藏的第五人，就是我们的指导老师，文学院副教授路杨。她一直支持和关注着我们的古城之旅。路老师是山西太原人，去年家乡暴雨，她也十分关注古城受损及保护情况，她通过梳理关于灾害语境下的文物保护及山西文物保护的相关研究文献，建议团队成员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特点与能力，在充分了解古城的受灾情况和现行保护措施之外，深入挖掘历史事实，尝试探寻古建筑保护的长效机制与应急机制，并鼓励我们将社会实践积累的信息、数据与见识、思考诉诸学术研究，从专业角度出发为家乡贡献青年的力量。”高子彦稍作停顿，继续道，“也正是因为老师对家乡的这份热忱，深深感染着我们。这一行，我重新走过河东大地，对这片土地所蕴含的文化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未来自己也将更加关注文物保护，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争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家乡古建筑的创新性保护贡献力量，传承好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近日，运城市泰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向市民介绍该公司红色展馆的藏品。

该展馆共分4个展区，展出的珍贵文史资料和实物有400余件，包括毛主席胸

章、伟人雕像、珍贵文书等，以此赓续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坚忍顽强的精神，同时激励每个员工爱岗敬业、奋发有为、坚定跟党走。

特约摄影 董应赞 摄

以青春的名义行走运城 抚摩河东

——中央民族大学“探迹·寻记”运城古城调研队小记

■本报记者 牛嘉荣

市群艺馆“诵节气公益小课堂”春分篇开启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亲爱的观众们，随着这诗一样的《二十四节气歌》，我们仿佛感受到了春之柔美、夏之热烈、秋之收获、冬之洁净……今日“春分”，春在枝头已十分。“春分春分，昼夜平分”。“春分”的“分”有两个意思……”市群众艺术馆的“诵节气公益小课堂”平台开课。线上课堂的专业老师讲授了“春分”节气的涵义、相关地理知识、史料记载和民俗内涵等。在线上平台，小课堂“春分”篇的浏览量日益增长。

诵节气公益小课堂是市群艺馆启动的线上传统文化道德讲堂之一。“春分春分，昼夜平分”，从春分开始，白天会越来越长，夜晚将越来越短，是草长莺飞的好时节。人们在大自然里玩耍，在线上平台学习，是另一种学习进步的好方式。”市群艺馆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为满足疫情防控期间群众文化生活需求，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市群众艺术馆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线上公益培训教学，利用线下录制、线上直播的方式，丰富群众线上文化生活，推出多种公益讲堂，包括茶艺、乐器课堂等。



文史考辨

日前，笔者在《全辽金文》一书中看到金末元初文学家段成己撰写的《河津县儒学记》一文，拜读后有了新奇且重大的发现。

《全辽金文》由山西大学教授阎凤梧主编，书中广搜博取，汇编辽、金二代的文章，系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重点项目，于2000年8月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第3557页选录了金末元初

文学家段成己所撰写的《河津县儒学记》一文，其中明确记述：“河津古龙门”

号称多者，鸿儒硕师，骚人辞客，往往辈出。其汉则司马太史之父子，在隋则王河汾之兄弟，唐以来如勃，如勳，如勳，如助（注：指王勃兄弟四人），以文名世者不一而足。”很显然，作者认定汉代司马谈、司马迁“太史之父子”都

是“河津古龙门”的“鸿儒硕师”，这就雄辩地佐证：在金、元时期，当时之社会就认定“司马迁是河津人”。

段成己是金代绛州稷山（今山西稷山）人，生于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金哀宗七年（1230年），段成己登进士第，授宜阳主簿。1234年，金朝灭亡后，段成己与其兄段克己无意仕途，

便隐居龙门山（今河津市北午芹一带）近20年。兄弟二人隐居龙门期间，依情山水，乐善好施，广交友人，成立诗社，互相唱酬，“日以诗文讲学于河汾乡里间”，对河津的历史人文了然于胸。

《河津县儒学记》一文是段成己76岁时（1274年）撰写的。该文比1342

年升任元朝监察御史的王思诚所撰写的《河津县总图记》关于河津“司马迁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茂之建石室，立碑树垣”的记载早68年，比元朝至正十七年（1357年）段循所撰写的固镇村创修上生院碑铭关于“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间出”的记载早83年。段成己是稷山人，王思诚是山东人，段循是陕西奉元路府判，这三位不同地域的文学家文章却异曲同工，都为“司马迁是河津人”给出了有力的佐证。